

雁荡山是如何成为世界地质公园的

◎岁月风云 □陈胜峰

雁荡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秋来归去雁山阿,为问龙湫谁谓那”“驿路入芙蓉,秋高见早鸿”,“花村鸟山”之名,“二灵一龙”之景,“十八寺十院十六亭”之盛,古来为雅士俗夫所共谈。徜徉山水间,禅起灵峰嶺,茫茫之中皆为缘。雁山不语,留下了我人生的标识。

2003年,年近不惑的我,有幸主政雁荡山。那年,组织任命我为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并打破常规兼任雁荡镇党委书记。不言而喻,这是对雁荡山保护开发的重视,也是对我个人的厚望和重托。从经济开发区到风景名胜,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工作性质转变这么大是我没想到的。2月14日,我在春寒料峭中赴任,望着天生丽质的雁荡山,既踌躇满志也不禁沉思:我该如何破题答题?

正在这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同志把一封来信批转给乐清市政府,又到了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这封信来自于时任省地矿局局长汤文权同志。信上说,联合国将评选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这相当于世界“双遗产”评选,如果雁荡山申报的话,极有可能入围。我读了李强书记的批示及这封信,眼前一亮,觉得找到了方向。我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游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观光游”正逐步转向“探究游”。游客们来到雁荡山,不仅要看看这个景点像什么,还要了解地貌特征是什么,从中探究地球演变的过程。为此,雁荡山在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的基础上,还需深入挖掘“科学探究”的新内涵,系统建设风景名胜、科学名山、文化名山“三大名山”。这个时候创建世界地质公园,于时势恰到好处,正好可以作为“科学名山”建设的重要抓手,引领雁荡山走上世界舞台。

那时,世界地质公园还是新事物,雁荡山是浙江第一个吃螃蟹的。万事开头难,其一是“经费关”。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是自收自支单位,办公经费比较紧张。时任乐清市市长黄正强同志专程来调研后,特地拨付300万元启动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款项,体现了对创建的认可,也让我更加充满信心。其二是“专业关”,创建工作非常专业,于是我邀请时任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姜建军同志到雁荡山考察,聘请南京地矿研究所陶奎元教授做规划报告,形成了一摞又一摞文本资料。



雁荡山风光

我自己也不断学习,从不懂到懂、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不少知识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清楚记得“雁荡山是最典型、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大陆架酸性流纹岩地貌”。其三是“程序关”,创建世界地质公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从市、省到国家逐级申报。为此我一趟一趟跑部门,一步一步去推进。其间,省市领导考虑到地貌的相似性,还把台州方山-长屿硐天、永嘉楠溪江打包纳入雁荡山方案。一路下来尽管难,但星光不负赶路人。雁荡山从2003年2月启动创建,到4、5月份获评市、省、国家地质公园,再到6月6日申报国家地质公园,11月22日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创造了当年申报、当年获批国家地质公园的最快速度。

2004年2月14日,恰巧我上任一周,雁荡山正式启动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我们借机加速景区环境综合治理、文化景观重塑,构建达到国际标准的地质地貌科普系统,建设雁荡山博物馆,创成中国青少年科学探险基地,举办首届雁荡山地质科学和风景旅游可持续发展论坛。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雁荡山的名气越来越大,“三大名山”也为大家所熟知。万事俱备,2004年10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推荐雁荡山为中国第二批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单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考察报告、申报书、申报视频等。11月,我带队到北京

参加世界地质公园推荐评审会,怀着进京赶考的心情,接受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赵逊等国内外地质学家的提问,最终赢得全场最高分,雁荡山顺利进入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名单。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主任、爱尔兰籍的埃尔德博士来雁荡山实地考察,由衷赞叹“雁荡山是岩石、水与生命交响曲,乃世界奇观之一”。

两年创建路,一朝喜讯闻。2005年2月12日,喜讯从法国巴黎传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专家评审会宣布,雁荡山获评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成为浙江第一家、全球33家世界地质公园之一。一时之间,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转载,《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一些专家学者感慨地说,这为浙江树立第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使雁荡山成为独一无二的集山水美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于一体的华夏名山。

时过境迁,记忆泛黄,但时间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2003年2月、2004年2月、2005年2月,这一个一个时间节点,正是雁荡从“中国名山”迈向“世界名山”的前进足迹。这么多年过去,世界地质公园仍是雁荡山最闪亮的名片之一。

从2003年起航,雁荡山走向了世界。

◎史林偶拾

竺可桢的胸怀和气度

□唐宝民

1936年初,气象学家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以务实创新的精神为浙江大学带来了新气象。他曾经在就职演讲时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校长任上,对教授们十分尊重,给予了细致入微的照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公开反对他的教授,他也丝毫不计较,同样给予重用,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

费巩教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说话毫无顾忌,他对竺可桢有意见,便在开教务会时,当着竺可桢和众人的面,对校长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此言一出,众人都愕然,担心校长会下不来台。可竺校长听罢却笑而不语,随后照常主持会议,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只有国民党党员才能担任大学的训导处长。竺可桢很欣赏费巩的才干,推荐他

做训导处长。可费巩不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上面不批准。但竺可桢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敬仰而能教课”,力排众议,不断与上面沟通,终于任命费巩做了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教授,他的脾气急躁、性情耿直,心中稍不满意,就指责、埋怨,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抗战形势危急,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束星北对此很不赞同,于是,一路上逮着机会就数说竺可桢的种种不是,对他进行讽刺和挖苦。但竺可桢却毫不在意。后来,在重新选聘教授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再继续聘束星北,竺可桢却在会上为束星北说了很多好话,顶着极大压力将束星北再次聘为教授,日后还费尽周折对他进行种种关照。

对于反对自己、当众冒犯自己的人,竺可桢不但不进行打击和报复,反而提拔重用他们,这种在为人处事方面不计较的做法,体现了他坦荡的胸怀和宽宏的气度。

郭沫若考证地震

□周惠斌

1928年10月至1929年11月,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书中引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诗句:“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瞻莫惩?”郭沫若认为:“单看这几句诗的光景,中国古时候好像也有火山。”指出它是我国最早描写火山爆发的文学作品。

1954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时,郭沫若觉得自己先前的说法并不正确,为此,他加了一段补注:“中国陕甘地区含有震源地带。《史记·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在秦国栏内有‘地动城坏’四字。在元、明时代均曾

有剧烈地震的记录。”更正了他原来的说法,指出《十月之交》那首诗写的是地震,而不是火山爆发。

1955年,郭沫若在一封信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探讨:“强烈的地震之前发现红光,这个现象在二千七百四十多年前的古人似乎已经注意到。《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所指的是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国语·周语》)的史实。《唐书·历表》据诗中所记日食,推定为周幽王六年,则当在二七四二年前。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说到‘电’。当时已经是阴历十月,是不应有雷电的,我揣想,可能就是地震前的红光。”

郭沫若的这段解释,考证出的是周幽王二年中所反映的地震发生的年份,后来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一条新注,收入《郭沫若全集》。

每天读三页字典

□赵盛基

2021年11月29日,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去世,陪伴了人们60多年的声音永远留在了人间。

1960年初春,一个偶然的机会,年仅19岁的方明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员被推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岗位。

办公室门后头挂着一张考核表,上面是每个节目播音员的名字以及播放的节目名称,空格处贴着小红旗和小蓝旗,“红旗”表示播音无差错,“蓝旗”表示播音出现了差错。结果,方明错误频发,名下的蓝旗数量直线上升,不是念了错字,别字,就是漏念了字。

方明很着急,前辈夏青看在眼里,对他说:“有不认识的字不要紧,可以向字典学习。字典总共才三百多

页,一天看三页,一年下来就看完了,就会认识更多的字,也就不容易出错了。”

听了前辈的教导,方明果然每天都认真地读三页字典,把读音、声调默默地记在心里。果然,通过读字典,他的业务能力大大提高,蓝旗数量不断下降。一年后,直到他的播音生涯结束,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当年,每当人们打开收音机,听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就会听到他标准、纯正、浑厚的声音。

方明的播音生涯中,字典成了他的“老朋友”,多种版本的字典陪伴了他一生。即使成了著名的播音艺术家之后,一旦有念不准的字,他也会虚心地向字典“请教”。

由于表现出色,他曾经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担任国家重大事项的播音员,还被誉为“播音界的常青树”。

唐宣宗教女有方

□刘跃

唐宣宗李忱是晚唐时期的皇帝,在位期间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史家称为“大中之治”。唐宣宗为君治国有道,为父治家有方,对子女管教甚严。

万寿公主是唐宣宗的爱女,唐宣宗选择起居郎郑颢为公主的夫婿。郑颢中过进士,以文才风度儒雅而著称。唐宣宗颁下诏书命万寿公主主要遵守妇人礼节,一切规矩都根据臣下庶民的习惯办法,并告诫万寿公主不得轻视丈夫家族的人,不得干预时事。

有一次,郑颢的弟弟郑颢患危急的重病,唐宣宗派

遣使者去探视,回宫后,唐宣宗问道:“万寿公主在什么地方?”使者回答说:“在慈恩寺观戏场。”唐宣宗听后勃然大怒,叹惜说:“我一直奇怪士大夫家族不愿与我家族结婚,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些原因的。”说罢立即召万寿公主入宫,让她站立在宫殿的台阶下,不看她一眼。万寿公主恐惧了,泪流满面地向父皇谢罪。唐宣宗责备她说:“哪有小叔子病危,嫂子不去探望,反而去看戏的道理!”

唐宣宗对自己宠爱的女儿要求如此严格,其他皇族贵戚都小心谨慎地尊礼守法,不敢有违逆。

孙诒让说留学及外语、数学学习

◎两浙人物 □周维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戊戌年,光绪变法维新失败。这一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清政府所杀,孙诒让听闻这个消息,在给汪康年的信里慨叹:“一旦遭此惨祸,国事何可问耶!”孙诒让是晚清中国浙南的开明绅士,治训诂、经学之外,兴实业、办教育,亦有作为。今天我们温故一番孙诒让关于出洋留学以及外语、数学学习的教育见解,应该也是有意义的。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十九日,孙诒让出生于浙江瑞安潘墩茂德里(今潘岱乡观下村)的书香门第。诒让天分高,后天受到父辈极好的古典教育,博览群书。可惜自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二十年(1894),诒让八应进士试而不中。光绪二十年,诒让47岁,这一次考进士落第,诒让从此绝迹科场,也再没有到过北京。他在浙南兴办新式教育,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诒让办教育,有一个很明确的思想。他在《复日本学者馆森袖海书》里说:“近者五州列强竞争,救焚拯溺,务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里说“富强之原,在于兴学。其事深远,非一蹴而能”。世事纷乱,救难济困,唯有启蒙国民,讲习科学。这是诒让意欲兴办新式教育的衷心。诒让在这封信里也反省自己“曩昔所业……屠龙无用”。诒让初办教育,不唯教学硬件设施不足,即教学人才亦匮乏,施教、受教双方皆茫然无知。“以今日吾国之学堂教育之无方,懵懵国民,于普通之知识尚缺其未逮,其施教也,恒扞格而不通,其受教也,若茫乎其无畔岸……”这是孙诒让《东瀛观学记》序里说的话。新式教育既然要兴办,师资不能承担,如何是好呢?诒让的意见是:“然则博观精考,采异域之长,以裨我之缺,其必不可以已矣。”孙诒让《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记录了诒让所说的补救之策:“建议选择国内聪颖子弟出国留学,以宏造就,最后达到英才辈出,不复依赖外人局面。”国内教育乏术,师资

不足,那就送聪颖子弟出国留学。诒让说的有理有据。至于英才辈出之后,是不是不需要出国留学了呢?应该不是的,文化科学的交流仍然需要。诒让这儿所说的“不复依赖外人局面”是相对于新学初起,乏教师而言的。不一定表达的是以后人才多了就不用出洋留学这样的意思。诒让既有送聪颖子弟出国留学的意见,也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予以实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诏兴学。诒让整顿温州府中学堂,须添聘教员,新学人材供不应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天,诒让在府中学堂举行茶话会,邀集瑞安普通学堂高材生的家长参加。在茶话会上,诒让鼓励学生家长送子弟到日本留学。这一年瑞安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实业诸科的学生计22人,学成归来分别到各中小学校任教。这也是温州近世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

和出国留学相关联的是诒让对学习外语的重视。语言是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向外国学习,语言这一关必须得过得。诒让在《周礼政要·通译》里写道:“日本变法以来,通国官民不识洋文者甚少。而中国除通商各埠外,识洋文者千人中无一二人,各省中竟有通府无一识洋文者。”诒让因此提出“今宜于各省广开方言馆,务使东西文家喻户晓”,在普通学校中也要开设外语课。诒让自己在55岁时曾从瑞安普通学堂西文教习蔡某处学习英文,可惜终因事务繁杂和精力稍衰而仅勉学三月。前举诒让撰写的《周礼政要》,原名《变法条议》,本是盛宣怀请翰林院编修费念慈撰著,费又委托孙诒让撰写的,以《周礼》为纲,以历代政治沿革损益大端为目,包举西政,寻其源出中法、可实见施行者,“条举而件系之”。诒让费时半月,光绪二十七年(1901)端阳后五日撰著完成《变法条议》二卷四十篇。原先说定盛宣怀呈呈,但盛后没有上呈这部《变法条议》。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诒让更名《周礼政要》,由瑞安普通学堂刊行。这部书有“西学中源”说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但这也是那时的一个时代的思潮,

身处其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洞察其弊,超越其上的。

“识洋文”是为了有助于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开悟国民,讲习科学”“唯督课以科学”。诒让以为科学技术中,数学最重要,化学次之,“泰西一切政教理法,无不以数学为根底”,因此在《周礼政要》里主张“由明算而旁及各种新学,如代分化合,动震动静诸艺……极深研几,弥纶大用”。以数学为科学中其他门类的基础,说明诒让对现代数学科学认识的透彻。诒让早先已有对数学这样的意见,才能在撰写《变法条议》时作出深入的表述。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诒让就首先创办了瑞安学计馆。他在《新开瑞安学计馆序》里说:“学计馆之设,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近世温州数学名家辈出,姜立夫、苏步青、柯召、方德植、张鸣镛、白正国、谷超豪、李邦河、陆善镇……或许也是诒让“泰西一切政教理法,无不以数学为根底”思想及其兴学实践致之?

诒让在浙南办学有成,学术声誉隆盛。光绪二十七年(1901)京师大学堂聘诒让任经学教习,诒让坚辞。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三次电聘诒让为武昌存古学堂教习,诒让亦不就。礼部设礼学馆,奏派诒让为总纂,诒让亦不入北京。诒让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定之《墨子间诂》初稿十九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定之《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已然是古籍研究的经典作品,帮助我们读通读懂《墨子》《周礼》。梁启超评《墨子间诂》“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章太炎论《周礼正义》“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诒让一生行事,或者也可以说明,治中国古典文献和接受西方近世政学、科学,也是可以不相矛盾的。学习古代学问并不必然就会拒斥现代科学,这之间不构成因果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学习现代科学,并不意味着必须销毁古代学问;也不能把不能很好地接受现代科学怪罪到古代学问的头上。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1850年宁波三江口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宁波在清朝属于宁波道所在地,是浙江经济次中心。图为1850年宁波三江口一景。

照片提供者:江甬